



旧年如梦

□蒲斌军

记忆中的年味,总是从忙碌和喧嚣间开始的。

“廿三祭祭灶,廿四掸掸尘”。腊月除尘,除尘布新,为的是把一切厄运、晦气统统扫地出门。一年忙到头,难得利用年前的空档收拾下屋子。老屋的门槛房梁,密布了蛛网,网上晃动着飞蛾或甲壳虫的尸体;里间的床铺和灶台,积满了厚尘,风一吹还四处扬洒……孩子们负责擦洗凳子、桌椅、灶台,长辈们打理擦洗门楣、屋梁。个子不够,搬来方桌再架上板凳,底下人死死地紧握凳柱,上边的则像个杂技演员踏上板凳轻拂尘埃。遇到顽固的灰尘污垢,先用井水浸泡一会,再用刷子来回搓洗,最后用报纸或毛巾擦净。倘若实在没人帮衬,碰上个急性子比如我妈,就会采取如下的做法:直接将桶水泼向门板,再用竹扫把象征性地抹几下,也算是过年掸过尘,图个心理安慰罢了。

杀猪,是过年最血腥,也是最热闹的场面。离老街不远处有处屠宰场,平日里“冰骨丝冷”,见不得几个人影。只有临近春节有了生色。从家里赶去屠宰的牲口多了起来,候在屠宰场门口伸展脖子的也多了起来。我和哥哥,赶着大肥猪,来到屠宰场。半个小时后父亲提着几刀条肉和猪头,母亲则提着一桶“肚里货”红光满面出来,另一只木桶还漾着冒着热气的猪血,这些都是新年祭祀的必需品,也是绝好的下酒

菜。杀了猪,卖了好价钱,便可以为家里便添置新物,比如一台期盼了一年的西湖牌黑白电视机。一家人围在一起,除夕便有了另一种光景——看春节联欢晚会。这过年的格调一下拔高不少。

村口路边的爆米胖声也响了起来。“爆米胖勒”的吆喝声一响,村民们便纷纷围拢过来。各家的器物里盛满了年糕片、玉米、大米等,客气的人家,还会捎上了木柴。打炮人放了糖精,和原料拌均匀了放入黑铁罐,呼啦啦地转上几十圈,等气压表上的指针指到某个点位,在“打炮啦”的提醒警告后,孩子们“哗”一下退开十来米。但听“嘭”一声,众人便冲入白雾,去抢食溅落的美食。当然也可以直接到生产队里,灌上几壶大米,伴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响,看柴油机头吐出丝状的长胖,再按一定长度折好后放入备好的袋子,最后用细绳扎好以防受潮。这些米胖,除日常食用,更多的是和糖果混在一起,作为大年初一送给孩子们的拜岁礼包。

大年初一,孩子们都会挨家挨户拜年,又称“讨糖”。穿上母亲赶制的新衣,新衣里外都是深深的口袋,主要目的是为了多装些零食。清晨四五点,阴沉沉的天,一群孩子如小兽一般结队出发了。一户户地敲门,高喊“拜岁啦”,主人早已将预备好的“汤水”一个劲地往孩子们的衣兜里塞。嘴巴甜一点的,“阿公好阿婆好”唤上几句,得到的美食自然就超多。有时也会遇到几个刁蛮的年

纪轻轻硬是让你喊他“阿公”,对此我是深恶痛绝的——为了自尊宁愿不受嗟来之物。于是头也不回地转到下一家。从蒲家一路拜到史家,直到将袋子也装得鼓鼓的,心满意足地回家了,交由父母分配。

等尝过糖果,用过早餐,就到附近的祠堂拜祖先。对于孩子而言,祭拜仪式常暗含游戏的成分。在祠堂前学着长辈的模样,举三支香象征性地磕几个头,念“祖宗大人保佑阿拉身体好,学习好”之类的祷词,似乎有点非懂似懂。去祠堂更多的是凑热闹,看叔伯们摇色子,打扑克,输赢都是小數,自然不会伤了和气,更多的则是活跃下过年的气氛。对于长辈而言,初一头等大事就是去坟头拜岁,俗称拜“坟头岁”,一则尽孝道表达晚辈的思念;二则是借此保佑晚辈平平安安,顺顺利利。带上纸钱香烛贡品等物,还不忘将坟头的杂草、灌木割除,为几个月后的清明上坟扫清障碍。小时候,祖父祖母、父亲健在,拜坟头岁自然也轮不到我,于是也便省去了这等复杂的礼数。

初一是一年的开始。按民间的说法,阳气初生萌动之时,还相当脆弱,所以必须窝在家里,绝不可到处捣脚。待到正月初二,阳气有所生长,便可以走亲戚了。“娘舅大石头”,第一户人家肯定是舅家了。从展茅到小展,要翻过牛鼻岭,可以步行或者坐车,但坐车要候班头,即便等到了也未必能挤上去,所以步行成了最好的选择。一家人提着走亲的包头,一路走

一路笑,约摸一个时辰可以到达舅家。糕点水果茶水早已备好,嗑嗑瓜子,唠唠家常,等饭菜上桌就可以开吃了。我是“外甥皇帝”,自然处处受到优待。这样一路走,一路吃,直到正月初七初八,鞭炮声才淡下来,四处游走的人们才闲下来。年味,才渐渐淡下来了。

如此消停了一个礼拜,正月十五悄然而至。在农村,没有猜谜,鲜有灯会,甚至吃汤圆也省落了。只有村里几户讲究的人家,会在楼上挂几个灯笼,远看像几粒红枣,总感觉有点格格不入。

如今,我居住的高楼,远比农村整洁,正月之前也无需花大力气除尘。电视早就被手机取代,连春晚都懒得瞄一眼。正月一早的拜年习俗也不知从何时起销声匿迹。比较热门的还是正月十五,各大商场社区张灯结彩,财力雄厚的还会举行灯会表演。随着父母相继离世,初一拜坟头岁倒是成为正月里的重头戏。至于走亲戚,似乎已可有可无,宁愿一家人去外地闲游,也不愿将时间耗在走走吃吃中。拜年的礼包也变成了钞票,压岁钱直接红包转给了……

“生活就像一杯茶,不会总是清甜的,有时也会夹杂着一些苦涩。”我们大可不必抱怨“年味淡了”,大可不必怀疑“人情冷了”,年在,年味就不会消失。它只能变了内容或换了种形式罢了。只要我们心中充满对美好事物的向往,就能在年味的变化中找到新的寄托。



欢喜过大年

晓明摄

小村年味

□安然

老家是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,父辈们都相继离开了人世,现在都是与我同辈的人成了支撑门户的当家人。由于我是吾辈年龄最大,所以全村的堂弟与他们的媳妇都称呼我“大阿哥”。过年的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给我,邀约我回小村过年,然后十多个兄弟相聚一起欢度除夕与春节。

现在小村过年,与上世纪那些年代过年大不相同了。首先是小村每家每户脱离了贫困,经济都富裕起来了,吃穿不愁,家有银行存款,六十岁以上的村民每月有社保养老金,有几个堂弟还成了大老板。他们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走出家门,走出岛门,绝大多数到离六横岛最近的宁波办厂或经商。在宁波办电镀厂、租赁商店营商,有的买了打桩机进行打桩,承包建筑工程,也有几个在杭州、上海,甚至跑到东北、深圳发展。

年龄最小的一位堂弟和他的儿子没出远门,就在六横龙山的一家船舶修造厂上班,我问他父子俩

年收入有多少?他笑呵呵地说,人均年收入有20万。

每年在腊月二十三那天,出门在外的人们开着轿车带着家眷陆续地回到了小村。腊月二十三是“灶君菩萨”生日,也称为是小年。当地村民有个根深蒂固的习俗,必需买好“祭灶果”,二十三晚饭后进行“祭灶”,保佑家里一年四季平平安安,特别是出门在外的人们更加讲究回家祭灶。祭灶之后,不再出门就在家准备过年,过了春节再出去务工赚钱。

于是,村子里逐渐热闹起来了,在村子里来来往往走动的人影多了,“阿哥”“阿弟”“阿嫂”“阿妹”“过年来啦”打招呼声多了,小孩子奔跑嬉闹声多了,大小车子进进出出喇叭声多了,宽阔的水泥村道边整齐地停放着一辆辆白色的、黑色的小轿车,村里的停车场专门停放着工程车,小村有了过年的味道,而且一天天淡了起来。

又是现在市场繁荣开放,过年的物资丰富,猪肉、羊肉,杀好了的鸡、鸭、鹅,做好了年糕、馒头、豆腐,还有糯米块,应有尽有。过去

村子里各家各户忙碌着蒸点心、揉年糕、做豆腐,搭浆板酒,低矮的屋顶上耸立的烟囱整日冒着白色烟雾,杀鸡屠羊,这种景象已消失了多年。

现在,村子里都是楼房、别墅,看不到有烟囱袅袅烟雾,听不到“嘚、嘚”揉年糕声,看不到手忙脚乱的人影。一切都是按着人们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着准备过年。

过了二十三,接下来是“掸尘”,小村十多户人家几乎同时进行的,虽然是楼房窗明几净,但是还是遵循旧习俗,进行一次清扫,一家人动手擦洗一下门和窗玻璃,屋前屋后打扫一番。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,在阳光下,闪着光亮,显示出过年的景象。

紧接着就是置办年货,准备年夜饭。有的开着小车,有的骑着电瓶车上蛟头街购买年货,兄弟们都商量好了,到了年三十,外出的兄弟们不论多远,多忙都一定回家过年。前几年受疫情影响,好久没有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了,今年好好地置办一餐,大家聚在一起欢乐欢乐。这是小村的好传统,兄弟们之

间和睦相处,邻里关系融洽。

小村大老板阿二开着宝马车,从街里装来了一车年货,还买来了两个“万事如意”大礼炮,一个礼炮一放就有10多响。他说:“一个是关门炮,一个是开门炮”。

小村过年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习俗,每户人家燃放关门炮和开门炮。关门炮就是在年三十晚上,客人都走了,家里的一切都整理好了,家里人都在家不再进出了,这时候就去大门外燃放三个炮仗(六横人称礼炮为炮仗),然后将大门关上,再也不开门了。一家人就围着等着由当家人分压岁钱,观看春节联欢晚会。直到正月初一,天蒙蒙亮时,打开大门放三个开门炮仗。放开门炮仗,是有竞争力的,谁家放得早,意思是谁家先接纳好运。我想:小村今年关门炮一定是轰轰烈烈的,新春开门炮会放得龙腾飞舞……

回老家过年,多开心呀,唱一曲《新年到》吧。“喜雀喳喳叫,新年又来到,农村过年好热闹,家家放鞭炮,十里八乡展新貌,村里村外人如潮”……

□力女

每逢年关临近,总觉得有些忙乱和慌张。街市上人流比往日拥攘了许多,菜市场、超市大商店更是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遇上年关口迫近,心绪反倒不宁了起来,人们急匆的脚步,让我心里感到怆然。时间于我在这个交结处,愈益变得紧迫。我感到时间与我擦肩而过的强烈感受,使我更加凄惶,年纪实在是长得太快了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对于年节的兴趣以及味道也比从前寡然淡薄了许多。我以为年节永远属于童年。

记得儿时,几乎在每年的年三十,东边的天色还没有发亮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就着衣起床了,父亲挑着箩筐,母亲提着灯,去菜园子割菜、拔大蒜。到太阳一露脸,父亲就挑着一担白菜和大蒜走在前面,母亲拿着一杆秤紧跟后面,俩人急急忙忙地赶往附近街道的菜市场去摆摊。我心里清楚,今天这担菜卖掉的钱,就是我们的压岁钱。弟弟比我年小四岁,他不知道其中的奥秘,还乎乎地睡得正香。我和祖母早早地坐在“火柜”上,心里喃喃地祈祷着:今天母亲能卖掉这担菜,同时翘首以待母亲能早点回来。

等呀等,等到吃中午饭,母亲还没回来,直到晌午,才看到母亲挑着箩筐,爬上小山岗,喘着粗气回到了家。祖母搬来了饭菜给母亲,并问母亲为啥介迟才来?母亲扒了一口番薯干饭,边嚼边回答:今天卖菜担特别多,东西两条街两边都摆满了菜担,附近的五星、龙山片的农民都把菜挑过来卖,甚至双塘片的也有挑来。由于各种菜多了,菜价也低了,白菜每斤1分半至2分,大蒜3分至5分。接着,母亲从箩筐里提出一刀猪肉,然后从一只布袋内拿出了一迭小钞票,并且叫祖母一起整理。

母亲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碗番薯干饭,急匆匆地收拾了碗筷。迅速地洗净这刀肉,祖母见状,二话没说钻进灶间帮母亲烧火,母亲煮肉煮菜,准备晚上一家人的年夜饭。腊月一到,小孩子最期待的就是这一餐年夜饭。因为,年夜饭餐桌上的菜比任何时候丰盛,有鱼有肉,最起码就是煮菜的菜油也比平日倒得多一些。在我心里这就是过年的味道。

每年全家人年夜饭后,母亲收拾完碗筷,拿出手帕裹住的钱包,挨

话说儿时过大年

□胡汉杰

早春节,冬意尚浓,恍然又到过年。说实话,我小时候对过年既喜欢又不喜欢,过年可以放假,但除夕要守岁,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,这对于一直习惯于早睡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煎熬。

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,有官灯,有纱灯……烛光辉煌,地上铺满了红竹叶埭,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,这当然有趣,可是寒风凛冽,吹得我小脸儿通红,很不舒服。压岁钱不是白拿,要扣头如捣蒜。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,长辈指着介绍:“这是你的曾祖父、曾祖母、高祖父、高祖母……”

姑娘爱花,小子们爱炮。放烟花,点炮仗,一簇簇烟花在空中绽放,把夜空点缀得璀璨绚烂;一串串鞭炮在雪地里“噼噼啪啪”炸响,雪片飞扬,飞溅的雪花和飘然而下的流星般划过夜空的烟花相映成趣,把夜空点燃得像白昼一样。

年夜饭例倒是特别丰盛的。大年初一不动刀,大家歇工,所以,年菜实际上是火锅菜。大锅的炖肉,加粉丝、加蘑菇、加冬笋、加土豆,煮完都放在特大号锅子、罐子、盆子里,此后随取随吃,大概十余天也吃不完,事实上天天打回剩菜,这这叫“囤羹桶”。除夕夜,年糕汤端上来了,我困得朦朦胧胧,哪有胃口去吃?胡乱吃几口,倒头便睡。

正月初一我特别起得早,换上新衣服,大棉袄加上一件蓝色的罩袍,穿上一双灰鼠绒绿“和尚式”的棉鞋,见人就得请安,口说“恭贺新禧”,还奉命去几家最近的人家拜年。

后来,随着岁月流逝,社会发展变化,我家的过年方式革除了许多

个的给我们分压钱,第一个分给年长的祖母,最后分给弟弟,不管分给我多少压岁钱,放心地都交给祖母保管。这时我的心里是热乎乎,期盼的是过年时压岁钱年年有增,哪怕是增一分,说明家里的经济收入逐年提高。

过年了,小孩子们期盼着新年里能添置一套或一件新衣服,我也不例外。这也是年味。母亲每年都要为我纳一双新的布底鞋。她让我双脚踩在报纸上,取下我的新鞋样,就开始打糍糊,把旧衣服的袖口、领子和破损的地方剪掉,一层一层贴糊在门板上,每天还不忘用一木槌在上面敲打,来回滚动上好几遍。等到那些“被糊”的布块干透,贴得牢牢实实,母亲就从门板上取下一块将布块揭下来,照着我的鞋样剪裁,在上面盖上一层白色棉粗布,开始用麻线一针一针地缝纳。有好几次,我半夜醒来,看见母亲仍在灯下为我纳鞋底,她还不时习惯地把手中的针头,往自己的头发里磨搓几下,并让我安稳睡觉,亲昵地告诉我,新年定有一双新鞋等着我穿。

儿时过新年,我穿的衣服绝大多数是用大人们旧衣服翻新,的身量的合称,毫厘都不差。有一年,穿的是蓝色印花布衣裳,那是祖母珍藏多年的大襟衫改装的,面前的两只口袋特别大,可是用的布料颜色不一致,口袋还能装东西,我穿着丝毫不觉得怪气。那件蓝色印花布衣裳比较厚实耐磨,我连续穿了两个新年,给了弟弟穿,直至他不合身。

我不是喜爱怀旧的人,但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值得回忆的太多太多了。正如歌中唱道:“多少城里的月光,黯淡在无眠的晚上,多少奔放的车厢,载不完沉重过往;故事的变迁,总要通过时间来收场;结局的篇章,能否写出当初的柔肠”。往事与我有着割不断的丝丝缕缕。我在其中见到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我母亲。她生育我不容易,养大我更是不容易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虽然家境贫寒,母亲跟着父亲一起辛劳,努力改变家庭困境,总希望让我和弟弟能有欢乐的童年生活。母亲她已辞世多年,而我仍然觉得她还活在我的心里。每逢过年过节,我就会怀念母亲和父亲。我觉得儿时过年有父母亲在就有年味。

年味在我看来更多的蕴涵着盼望,就像我小时候盼着过年……